

终生奋斗 肝胆相照

——忆原市政协副主席

高级工程师欧阳维欢

巩 俊 轩

欧阳维欢，由于深孚众望，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欧阳老。

欧阳老是阜新地区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知名人士，是阜新市民主同盟建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土木建筑高级工程师。1957年6月以来，历任民盟阜新市筹委会副主任、民盟阜新市委副主委、代主委、顾问；1960年2月至1988年1月，连任第一至第五届阜新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6月至1985年12月，驻会）。他是第二届、三届辽宁省人大代表，第二届、四届、五届辽宁省政协委员，民盟辽宁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六届阜新市人大代表。

在4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欧阳老以精湛的技术，热忱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终生奋斗，作出显著成绩；以作诤友的赤诚之心，积极从事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组织领导工作，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阜新统战、政协工作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欧阳老于1991年8月6日与世长辞，他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欧阳老1914年8月生于湖南省宁远县，1934年毕业于江

西高级技术训练班土木工程系。1935年至1949年11月，在湘黔公路工程局、川滇东路工程处、军政部兵公署第十一工程处、交通部驿运总局毕节工务处、江西省全万路工程处等单位，任工区长、副总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分段长、总段长。响应党和国家建设东北的号召，1949年12月，欧阳老应聘毅然来到阜新矿务局工作。1950年至1952年，任该局工务处、计划处副工程师，基本建设总公司计划科长兼设计科长、工程师、副经理。1953年至1966年6月，任该局设计处总负责人、国外补充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计划处主任工程师。1966年7月至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受迫害。1977年在阜新矿务局建设处退休未退岗，1980年在该局技术委员会任高级工程师。

欧阳老刻苦钻研技术，40多年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通军需和民用运输线，他就参加了湘黔公路及川滇东路的修建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50年代和60年代，他精心筹划阜新煤矿的建设和计划工作。在东北地区编制基本建设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如何编制基本建设计划》的发言，并经整理发表在《中国经济》刊物上；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海州露天矿、平安竖井和新邱竖井三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国外补充设计工作；他结合实际撰写的《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煤矿建设要坚持大、中、小结合》和《群众路线是计划工作的基本路线》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东北日报》和《北京矿业学院学报》上；他积极发挥为矿务局领导当参谋的作用，注意宏观上的指导和调控，抓好煤炭生产的采区接续、矿井接续和矿区接续，以及生产、生活、文教卫生等各项事

业的综合平衡；他在将阜新煤矿建设的重点转向西部矿区的工作中，编制了远景规划，提出相应的建议。阜新煤矿的建设和发展，凝聚着欧阳老的心血。不仅如此，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到农场“劳动改造”，虽身处逆境，却仍潜心学习兽医，为农场及附近生产队和农民饲养的牲畜防病治病，继续为人民做好事。

欧阳老为市民盟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盟员普遍遭受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盟员仍心有余悸。在发展新盟员很困难的情况下，欧阳老与其他负责人一道，认真组织盟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狠抓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党委落实盟员政策；走访有代表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发展新盟员，建立基层组织，成立民盟市委会。他带领专业人员，并从沈阳、大连等地请来著名专家、学者，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进行“智力支边”，完成棉织厂、造纸厂等企事业单位提请支援的20多项课题。到1989年9月，阜新市民盟从刚恢复时仅有17名盟员和1名专职干部，发展到有279名盟员、18个基层组织、6名专职干部和比较健全的办事机构，以及工作日趋活跃的新局面，有欧阳老的一份重要贡献。

欧阳老热心人民政协工作。1977年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但他却没有休息，继续做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而且许多有成效的工作都是退休后做的。1981年，在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他同另一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市政协矿区煤矿工作组的委员，深入厂、矿搞调查研究，通过反映情况、提

建议、开协商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等途径，先后协助党委解决矿区13名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平反、安排使用、生活困难等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同年11月，在市政协四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上，市长林声作《关于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报告》。会议就此报告进行讨论时，欧阳老针对市区至矿区五龙、平安的公路与铁路的交叉路口很窄，车水马龙，拥挤不堪，经常肇事的问题，提出再开一个道口、构成双行线运行的建议。经充分协商，林市长采纳了欧阳老的建议。市政府将五龙道口复线工程列为1982年办的16件大事之一，新建了一条长500米的道路，新开辟一个道口，与原道口并排，实行单向通行，解决了交通“卡脖子”问题。1982年，欧阳老与另一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矿区煤矿工作组的委员，到清河门等地搞调查、勘测，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加速清河门新镇及西部矿区工人村建设的几点建议》的提案。提案提出的关于由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成立清河门新镇建设指挥部、作出新镇建设总体规划、坚决制止旧镇动迁后再重建、设置清河门区政府等五点中肯的建议，均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加速了清河门新镇的建设。1983年，他与另一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有关委员到外地考察、在本地调查、试验，终于在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在有关厂、矿及工程技术人员努力下，获得矿井水利用的初步成果。

1985年，贯彻市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议，关于以改革的精神开拓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领域，开展经济技术咨询活动的决定精神，欧阳老与另一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由市政协矿区工程技术和城乡基建两个工作组，以及专业对口的专家、教授共20多人组成的咨询组，分别下乡，对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的大巴和建设两个乡的水泥厂扩建、大理石开发及莹石矿、石灰石矿和沸石矿的开采五个乡镇企业建设项目，开展现场科技咨询活动。

大巴乡水泥厂扩建，套用贵州省一个水泥厂的图纸，自行设计，自行施工。1985年3月，厂房基础工程完工，经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基础抗压力不够”，要求炸毁已建成的基础，重新勘测、设计、施工。正在这时，欧阳老带领咨询组赶到。咨询组作现场勘测后，确认县主管部门提出的“基础抗压力不够”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感到炸毁原基础也不是一件小事，须慎重从事。于是，欧阳老带领咨询组当日返回阜新，并连夜在家中召集市政协委员中的高级土木建筑师及有关人员开会，经研讨论证，确定运用“反应力承重”原理，采取补救措施解决“抗压力不够”的问题。根据上述原理，欧阳老组织设计人员为大巴水泥厂重新作了设计，不炸毁原基础，在12根柱子的两侧加“腿”，以补救承重之不足。结果既避免了18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又缩短了建设工期。这种补救措施得到辽宁省建筑设计院的好评，说这是个创造，最简便易行。大巴水泥厂扩建工程已于1987年9月1日竣工投产，年产325号水泥1.5万吨，实现年产值200万元，利润10万元。

1985年春天，一次，欧阳老在大巴乡政府办公室发现一块五颜六色的石头，乡里的一位同志对他说：“这是我们乡陈家梁的石头，那儿有的是，当地群众用它砌院墙，盖房子打宅基”。欧阳老惊异地说：“这是大理石啊，是宝贝呀，随便浪费太可惜啦！”于是，欧阳老立即到陈家梁去考察。一看，果然在地面上露着许多亮晶晶的大理石。他选了几块

带回来，经辽宁省第四勘探队作技术鉴定，证明样品质地坚硬，色彩鲜艳，是大理石的上品。为了开采大理石，欧阳老带领搞地质的教授、工程师先后到陈家梁考察8次，连端午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经他邀请省第四勘探队总工程师张嘉宾带人勘探，大理石的储量约3900万立方米。这时，欧阳老的心里乐开了花。他深情地对乡干部说：“若是把大理石矿办起来，大巴乡就是阜新的富裕乡了！”为了坚定办大理石矿的信心，解决资金和开采问题，同年八九月份，欧阳老会同市银行、建材局及大巴乡的负责人，两次去海城孤山大理石矿考察。他第二次去时，正是辽南抗洪抢险之际，路被水冲坏了，汽车转来转去，这位72岁高龄的老人一天坐汽车长达14个小时。可见，他老人家确实把晚年的心血浇灌在乡镇企业这朵花上了。由于资金短缺，大巴大理石矿虽未大规模地正规开采，但在1985年末，采取土法上马，建起厂矿合一的企业，加工地板砖的原料——米石出售。据1988年末统计，年产米石1200吨，实现年产值20万元，利润1.3万元。

受市政协的委托，1985年4月，欧阳老以离退休的政协委员中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办起腾飞建筑设计院，由他担任院长。到1989年8月，该设计院共承担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194项，完成设计总面积达20多万平米。而且，对乡镇企业及教育、宗教等事业的工程设计，免收或减收设计费。他还亲自作了政协党派办公楼和海州清真寺的设计。该设计院的组建，既发挥了老工程技术人员的“余热”，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人。就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惦记着阜新市的城市建设工作。生前，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叫作：

“老骥伏枥退休续谱青春曲

苍松傲雪终生永唱奋斗歌”

这正是对欧阳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精神的生动写照。

欧阳老平生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统战和政协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政府给他很多荣誉。但他在成绩面前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谦逊的本色。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取与义，临财廉”。退休后，他做政协、党派工作，搞科技咨询，进行“智力支边”，都是白尽义务，分文不取，而且上山下乡连应得的补助费也不要。他担任腾飞建筑设计院院长，也从不拿大钱。欧阳老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许子女借老子职权谋求特殊。欧阳老对待同志很宽厚，他会看别人的长处，善于团结人。许多人都愿意接近欧阳老，所以他的朋友多，工作能打开局面。

欧阳老常说：“久在寒中知温暖”。他经历过旧社会，目睹国民党政治腐败，国家百孔千疮，民不聊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封、官三座大山，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欧阳老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两条重要结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并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身体力行地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欧阳老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多得的诤友。

耿耿忠心乌金情 参政议政白头翁

——记原市政协副主席

高级工程师袁乃勤

巩 俊 轩

生于南国的袁乃勤却在塞北阜新煤矿奋战36个春秋，无情的时光悄悄地将他的满头青丝染成了缕缕白发，然而他的心弦始终紧扣在乌金上；不仅如此，年逾花甲的袁乃勤又热忱地挑起参政议政的重担，甘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贡献。

袁乃勤，1922年11月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45年8月毕业于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响应党和国家建设东北的号召，1950年3月，袁乃勤应聘从广东来到阜新矿务局工作。1951年，他被选送到苏联学习露天采矿技术，先后在卡拉岗达、乌拉尔、库茨巴斯等煤矿，从打眼、放炮、采掘、线路学起，一直实习到局总工程师。学完回国，1954年至1957年8月，任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第一位副总工程师。

袁乃勤深知，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礼当毫无保留地把它奉献给党和人民。他的最可贵的精神是，在生产技术上勇于发表见解，敢于负责，从不怕担风险。海州露天矿是苏联设计的，当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可袁乃勤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改进了苏联的技术设计。原设计规定作业采场的采宽为6米，可实践中行不通，他便改为9至11米；原设

计规定架线的间距为6米，因实践中安全系数低，他却改成6.5米至8.5米。就这样，袁乃勤多次解决生产中的疑难问题，为新中国的露天采煤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7年9月，袁乃勤被错划为右派，由副总工程师降为放炮工。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没变，对技术负责的精神没变。在爆破队“劳动改造”期间，他发明了空气柱充填爆破法，提高煤的粒度30%。这项先进技术曾得到市的表奖，并先后被新邱露天、抚顺露天及全国的许多煤矿采用。在两年多的生产劳动中，他把发现的实际问题加以综合研究，向上级提出改进生产技术的一百多条建议，引起领导的重视，大部分被采纳了。海州露天矿的平台原设计每阶高16米，而电铲只能铲10米高，因此，岩石滑落，多次造成伤亡事故。采纳他的建议把每阶平台高度降到12米，既保障了安全，又促进了生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乃勤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也得到平反。自1978年至1986年12月退休，先后在阜新矿务局生产技术处、技术委员会和职工大学任副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安定团结建设四化的政治环境给袁乃勤驰骋才华创造了先决条件。他感到政治帽子没有了，头上轻松了，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腔热血勤珍重”，他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和专长无私的奉献给煤炭事业。

1978年，海州露天矿缺口煤炭70万吨，袁乃勤心急如焚。于是他多方查找资料，在写给该矿党委书记宋炎的信中，提出将采煤段高由8米改为10米，提高出煤量25%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在提出8年之后的1986年，才在赵长青等

工程技术人员的主持下变为现实，然而，多年来海州露天矿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却有袁乃勤的一份贡献。1979年袁乃勤任矿务局生产技术处副主任工程师时，遇到了新邱露天矿第六次扩采方案被上级主管部门否决的问题。有的虽然认为这个否决是不合适的，但因是上级决定只好照办。而袁乃勤则不然。他认为既然否决是不对的，尽管涉及上级，我们负责技术工作的也要有理有据地再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对党对人民负责。于是，在他的建议下，经过周密调查研究，阜新矿务局又重新给煤炭部写报告。凭借翔实的数据和精确的论证，新邱露天矿第六次扩采方案获得煤炭部批准，使原来扔掉的1200万吨煤炭重见天日，让新邱露天矿延长生产寿命10年。

袁乃勤不仅对上级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而且还敢于在多数技术人员反对的情况下，坚持科学，坚持真理，不讲情面。1980年，在五龙矿开采235采区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多数人认为，为避免海州露天矿西南帮滑坡造成整个露天矿停产，只能用水沙充填法开采；袁乃勤等少数人则认为用综采机组大冒落式开采，每年增产煤近20万吨，节约投资1000万元。一位好心人劝袁乃勤说：“右派帽子压你20多年，刚改正不久，何必冒这个险呢？搞不好身败名裂，五龙矿多出煤，你不能多拿一分钱，别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袁乃勤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干四化，要敢于负责任，不能怕担风险。如果我们这些搞技术决策的人，都人云亦云，不讲科学，不讲真理，只讲面子，明知不对也随声附和，那是对人民事业的犯罪行为”。于是，他用精确的数据科学地论证了用综采机组大冒落式开采，既能增产煤炭，

又能避免海州露天矿西南帮滑坡的意见，使主管领导坚定了用综采机组大冒落式开采的决心。经反复研讨论证，1982年3月，矿务局决定五龙矿235采区实行综采机组大冒落式开采，至1993年底，该采区已采出煤炭346.8万吨，节约成本1500万元，而且根本没发生海州露天矿西南帮滑坡影响生产的问题。实践证明，袁乃勤等人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

30多年来，袁乃勤结合技术实践，潜心钻研并著述露天开采理论。早在50年代任海州露天矿副总工程师时，他就披星戴月地写出40多万字的露天采矿、露天运输和电铲讲义，利用业余时间和技术训练班和电铲司机班的学员讲课。在此基础上，他昼夜兼程地写出了《露天采矿学》、《露天矿放炮》和《电铲》三本书，均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使中国煤炭工业有了自己的露采专业书籍。1981年至1984年，袁乃勤又写出《放炮》、《露天矿穿孔》、《排土》、《露天矿准轨铁道工程》、《露天矿铁道维修》五本书，进一步丰富了露天采矿的技术理论。1986年，《当代中国》一书出版，其中的煤炭工业编露天章就是他撰写的，他还担任了这章的编写领导小组组长。

晚年，特别是1983年任市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阜新市委主委后，根据党的统战工作需要，袁乃勤把主要精力放在参政议政方面，在阜新九三学社和市政协的建设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历任九三学社阜新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他是第一届、二届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八届、九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连任第五届、六届阜新市政协副主席。

(1985年12月至1988年1月，驻会)，他是第九届阜新市人大代表，第一届、四届、五届、六届辽宁省政协委员。

袁乃勤副主席在市政协工作方面有许多建树。阜新是严重缺水城市。据1984年统计，城市日需水量18万吨，而实际日产水量才13.2万吨，日缺水近5万吨。为此，1984年9月，市政协组织考察组，由袁乃勤副主席和市政协城乡基建工作组组长肖严带队，有市自来水公司经理冯玉书及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一行5人，赴大连、青岛两市考察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工作。考察组把大连、青岛两市供水管理经验同阜新市供水管理现状，加以比较对照，进行综合分析。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大连、青岛均在75%以上，而阜新只有37%；每万元产值耗水量，大连为50.6吨，青岛为56吨，而阜新高达362吨；居民每月人均用水量，青岛为0.7吨，大连为0.75吨，而阜新却达到1.5吨。可见，阜新水的浪费是严重的，节约用水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在袁乃勤副主席和肖严的主持下，考察组写出《对解决我市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考察组在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强调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并相应地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市节约计划用水办公室；要抓重点带一般，首先抓好工业用水的节约；要注意调动用水单位和供水单位两个积极性；对节约用水单位要给予奖励等建议。这些建议均被市建委和自来水公司采纳。首先，强化节水机构，将节约计划用水办公室从水源办公室中分出来，成为对全市节约计划用水的专业化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从原来的5人增加到8人。其次，狠抓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业生产实行循环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民用水实行水表进户计量供水。再次，严明赏罚，节水奖励，浪费水罚款。自

1985年起，全市每年节水200至300万吨，节约水费60至90万元。

1985年，根据市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议精神，袁乃勤副主席与另一名市政协副主席，带领由市政协矿区工程技术和城乡基建两个工作组，以及有关的专家、教授共20多人组成的咨询组，分别下乡，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巴和建设两个乡的水泥厂扩建、大理石开发及莹石矿、石灰石矿和沸石矿的开采五个乡镇企业建设项目，开展现场科技咨询活动。

建设乡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由于缺乏技术，没有作勘探和设计，八个山头下边都储藏着重晶石，但储量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已建的重晶石矿（一个山头）处于盲目采掘状态，用中间砍一刀的办法开采，不搞剥离，土石混采，结果把直径200厘米以下的碎石与土混在一块而扔掉，浪费重晶石30%；而且只开采到负10米，把负10米以下的资源都抛弃了。针对这些情况，袁乃勤副主席带领咨询组进行一系列的科技咨询。首先，袁乃勤副主席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测量。经测量的一个山头的储量为3400万立方米，从而估算建设乡重晶石的储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其次，咨询组建议开采到负50米，能增加重晶石可采量2500万立方米。再次，袁乃勤副主席为这座重晶石矿作了五年的开采设计。根据这个设计，银行贷款12万元，解决了建矿资金问题。按照这个设计，先剥离土后采石，并在剥离、运输、打眼等方面实现小型机械化，从根本上解决了土石混采影响质量、降低成材率的问题。年产量从2.7万吨提高到7万吨，年产值从12.5万元提高到35万元。为此，建设乡党委和政府赠给市政协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年过花甲献技艺，壮心乐为展宏图”14个大

字，以表达对袁乃勤、欧阳维欢两位副主席及咨询组的感激之情。

1986年，根据市政协五届十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在新邱煤矿萎缩的情况下，市政协组织力量，对新邱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调查，提出建议方案的决定精神，袁乃勤副主席带队，有市、区有关政协委员、专家及矿务局集体公司和新邱矿部分领导干部共30多人参加，组成四个专业组，分别深入矿内各厂、段及区内主要中、小企业，就当前现状及今后如何发展等问题，作了为期四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由袁乃勤副主席执笔，经新邱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新邱矿领导的讨论；以及市政协驻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作修改后，形成《关于新邱地区发展战略建议草案》，报送领导机关参阅。这个《建议草案》提出“新邱的今天就是20年后的阜新”的卓见。这次调查为市政协以后调查我市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开了先河。

元末明初诗人、画家王冕题咏用墨画的梅花的诗，最后两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恰是对袁乃勤几十年心系乌金，无私奉献，年逾花甲，参政议政弥坚，这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和精神的生动写照。

心系阜新 志在桃李

——记原市政协副主席 教授王植棠

巩 俊 轩

第四届、五届阜新市政协副主席、阜新矿业学院教授王植棠，生于南国，却扎根塞北；以其辛勤的耕耘，培植出满园桃李。由此而赢得人民的赞誉，社会的尊重。

王教授是鱼米之乡的浙江省黄岩县人，194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1950年来到塞北风沙地区的阜新扎下了根。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也思念着亲朋故旧，但他更爱阜新。当初，王植棠应东北人民政府的招聘来东北，路过杭州时，一位同学劝他留在杭州工作。他回答说：“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多年，千疮百孔，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到那里去建设。”全家来到阜新，他的爱人一看，城市小，风沙大，房子矮，路不平，心凉了半截。王植棠劝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上海、杭州是好，但也是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地工作，阜新也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王教授的理论基础打得扎实，在函数论和概率论方面造诣较深。后来，一位老朋友推荐他到外地一所条件好的大学去任教，他谢绝说：“我眼看着阜新矿业学院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我和阜新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绝不能离去。我要把我的一生全部奉献给阜新的建设事业！”王教授不仅自己安心在偏僻的阜新工作，而且还用切身体会教

育学生热爱边疆。1964年有一名学生毕业，被分配到西北，不安心工作来信诉苦。王教授给这个学生回信说：“年轻人生在福中要知福。正因为那里困难才让你们去建设；我来到阜新的时候，阜新也很苦，现在不是好多了吗！你们那里将来也会好起来的。”他说服了这个毕业生留在边远地区工作。

王教授在阜新度过的四十多个春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遇到过一些坎坷，几次政治运动都挨了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反革命”，接着下放农场劳动两年。但是，王教授“受屈不改心”，对党和人民的感情没变。在农场时，每月的四天休假日，王植棠回到家里把门闩上，攻读数学书籍。他坚信知识终归是有用的，党绝不会抛弃知识分子。

王教授热切追求的是：用所学的知识，培养出一批一批的四化建设者。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好地实现了。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他先后被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于198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教授的心情格外高兴。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干劲更大了。虽然年过花甲，却仍然在教学第一线讲课。他在中专和大学共讲课八千多课时。他刻苦钻研的精神更旺盛了。他先后在有关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对角型矩阵与稀疏矩阵》、《一类三对角矩阵的特征多项式的特性》两篇，曾在东北地区计算数学学术交流会上宣读；《 t -分布渐近性的几种证法》、《Behyens—Fishey问题的一种新解法》、曾在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上交流。他编写研究生及大学本科教材《计算方法》、《计算数学》等十来部，共70多万字。他还与另一

位同志合译外国教材60多万字。

1988年1月退休后，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王教授创办了阜新民办大学，并出任校长，继续为培养阜新的经济管理人才作贡献。

如今，王植棠教授的学生遍及全国煤炭战线，许多人当上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还有一些任副教授、教授。面对这种“春风桃李花开日”的喜人景象，王植棠教授真是别有一番幸福欢乐的滋味在心头！

王植棠教授是第三届辽宁省人大代表，第五届、六届、八届阜新市人大代表，阜新市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作为代表性人士，王教授在1980年8月至1988年1月任阜新市政协副主席期间，积极、带头参政议政，努力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关于北京至丹东的快车经由阜新运行，就是国家铁道部采纳王植棠教授提案的建议而开通的，为发展阜新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宝贵贡献。1983年4月，王教授提出“关于从北京出关的直通快车应有一对经由阜新市运行”的提案。提案指出：阜新是煤电之城，是东北能源基地之一，但从北京出关的快车没有经阜新运行的，这对繁荣经济、加快科技和文化交流都很不方便。提案建议从北京出关的直通快车有一对经由阜新运行。锦州铁路局接到提案后，及时给铁道部写报告，铁道部答复：“接受王植棠提案的建议，待将来全路调图时加以解决”。1985年1月，铁道部决定北京——丹东的297/8次直通快车经由阜新运行。1月31日，丹东——北京的298次直快首次从阜新通过。从而结束了阜新往返京城无快车通过的历史，这对阜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